

Collected Papers

of Chongqing Hongyan Revolutionary
History Museum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论文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 编



红岩联线

G26
12

Chongqing Hongyan
Revolutionary
History Museum

Collected Papers

of Chongqing Hongyan Revolutionary
History Museum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论文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论文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229-06330-6

I. ①重… II. ①重… III. ①革命传统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D6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856 号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论文集

CHONGQING HONGYAN GEMING LISHI BOWUGUAN LUNWEN JI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郭宜夏 漆

责任校对:何建云

封面设计:刘洋

版式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刘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16 印张:17 字数:340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330-6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编委：厉 华 周万炯 李 葭 龚月华 王 进

研究开发——历史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

——代《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论文集》序

厉 华

红岩,原是重庆一地名,如今更是重庆显著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坐标。有人说,红岩是一座巨大的矿山,矿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红岩作为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红岩作为文化则是历史,以精神内涵为主要存在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多次开发和重复利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注重红岩文化的多元化研究和开发。2009年,博物馆提出“量化管理、研究开发、人才培养”思路,把研究开发明确为工作重点。2010年以来,博物馆又紧紧围绕“体制创新提品质、研究开发三贴近、红色旅游抓特色、量化管理增效益”目标扎实推进,在学术和理论研究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进一步为红岩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为红岩文化发挥现实作用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拓展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馆藏文物是博物馆含金量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拓宽视野,从中国内陆城市和地区展开,直至香港、台湾,甚而远涉重洋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着力于全方位文物资料征集,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仅2011年到美国征集的文献就有中文资料608件,1228页;英文资料147件,3339页;中英文资料17件,201页;照片资料794幅;实物资料204套,772件。目前,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总量为98739件,其中一级文物25件,二级文物44件,三级文物661件,一般文物98009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奠定了红岩文化长足发展的坚实基础。

“钻进来,走出去。”这是红岩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途径,更是永葆红岩文化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证。多年以来,以厉华为代表的研发团队以文物史料为基础,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从事文物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以及文化现象和学术理论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红岩文化不断向更深、更宽、更高领域发展。

还原于历史的真实。博物馆是城市的记忆,更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再现。研究历史首先是要还原真实,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在文物资料的基础性研究中,不是把文物束之高阁,而是尽力将

文物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思想价值外化展现出来,真实地告诉人们是什么、怎么回事?为了弄清一段史实、一个故事、一个情节,甚至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的“字”或“音”,往往要查阅无数的文献资料,花上几万元的差旅费。但红岩历史文化研究队伍在工作中没有半点马虎,而是认真考证。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在红岩历史研究中,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客观地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反映真相。如:研究烈士人物许建业(《红岩》小说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并非仅刻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同时也真实地把他在狱中心存幻想、轻信谎言向特务求助,使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的重大失误客观地反映出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少石迷案”上,也并非牵强附会地将责任推至国民党当局和特务头上。还原真相,这是文物基础性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真”的东西才能让人接受。

致力于文化的宣传。文化是一种力量。红岩文化是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红色革命文化,必然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宣传工作推向改革创新浪尖的浪尖。多年来,博物馆坚持应用性研究“三贴近”原则,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外化和宣传。红岩魂陈列馆、红岩村、特园中国民主党派三大基本陈列展览,红岩文化宣传网站以及巡展、巡讲报告已成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全年365天的全日制开放,每年讲解突破10000场次,每年作专题报告100余场,受益观众达600万人次。此外,博物馆还研究开发了报告展演、舞台剧、电视片、图书近100部,纪念品20余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掀起了红岩精神和红岩文化宣传的新高潮!可以说,从《红岩》到《红岩魂》,再到《红岩文化》,博物馆在应用性研究和文化传播中,取得了令人夸赞的可喜的巨大成就,走出了一条盘活革命文化资源的成功之路。

着眼于社会的现实。历史博物馆不仅仅是保存城市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启迪人、激励人。文化的功能也并非娱乐,而是以文化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与时代要求脱节,与社会生活相背离,无法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和精神追求,那么它绝无生命力可言。文化研究不是艺术而是学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研究中紧扣时代,密切联系实际,从文物史料中去发掘、提取和升华民主政治建设所依、社会发展所需、人民精神世界所期的精髓实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激发了红岩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红岩文化研究不仅“钻进去”考证与还原历史,更注重从历史和人物中“走出来”,站在更广阔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与“社会”问题,以革命先辈、烈士及其有关事件方面的研究成果,诠释了人性的真、善、美,解答了“人该怎样活着”、“该怎样追求”、“该怎样奋斗”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要性;以统战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从而凝聚社会建设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博物馆也加强了红岩文化现象和博物馆运营方面的研究,探索和积累了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红色文化的许多先进经验。

博物馆负有保存、传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历史使命,而研究开发,以史资政、以文化人则是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路在脚下,继而扬鞭奋蹄!

目录

contents

研究开发——历史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代《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论文集》序 / 1

陈列展览的外化 / 1

《红岩恋——江姐家传》史实评析三则——与作者丁少颖先生商榷 / 4

小说《红岩》与红岩历史背景 / 9

历史文化名城中的红岩旅游资源 / 22

创新红岩精神的传播手段 / 35

革命纪念馆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阵地作用的思考 / 38

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的思考和建议 / 42

关于中美合作所 / 47

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 / 50

红岩精神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 / 76

红岩精神形成渊源及历史内涵探究 / 84

红岩联线的发展和运作 / 93

安全外交——中美合作协议第18条的背后 / 110

红岩文化与重庆城市精神 / 122

积极探索法人治理结构 稳步推进红岩联线文化事业科学发展 / 126
红岩魂——革命纪念馆的管理与创新(一) / 130
路在脚下 持之以恒 / 136
南方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40
浅谈博物馆的展示空间设计 / 147
浅谈南方局青委及其开展的工作 / 15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发挥社会职能作用 / 155
试论江竹筠姓名音读 / 160
释“大有农场” / 166
爱国主义是革命纪念馆永恒的主题 / 168
突出红岩特色 整合革命资源 / 172
感受真善美的生命力——红岩艺术现象研究 / 175
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发展:1949—1976 / 183
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 / 190
中国红色旅游文化产业案例——红岩联线文化旅游产业 / 201
红岩魂——革命纪念馆的管理与创新(二) / 207
重庆大轰炸的见证物——棉花街壁报 / 220
重庆统战文化建设路径探究 / 224
周恩来抗议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暴行 / 231
红岩精神的时代特征——兼析红岩精神与井冈山、长征、延安精神的异同 / 237
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管窥 / 242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 / 246
周恩来抵制蒋介石“溶共”的斗争 / 257

陈列展览的外化

厉 华

在街头路边,在公园车站,在电视报纸,在学校商店,我们可以看见娃哈哈、嘉陵摩托、可口可乐的广告宣传。谈起他们这些商家的效益往往是令人羡慕,看见这些商家对自己的产品运用各种手段来对它进行宣传展示也确实给人许多的启示。市场经济的法则毫不留情地淘汰了“好酒不怕巷子深”的经营操作方法,充分利用一切手段尽情地去外化展品的价值,只为取得最大的效益。当陈列展览从博物馆这一古老领域走到其他领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陈列展览的手段被科学技术大大地提高从而扩大了展陈空间的时候,当各式各样的陈列展览涌入社会市场的时候,从事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眼界被打开了,视野开阔了。陈列展览要有吸引力和产生效益就必须尽情地外化。

虽然从传统的观念、模式中走出来是痛苦的,但面对市场的具大吸引力又使我们能够摆脱烦恼。纪念馆对社会要有吸引力,纪念馆要得到效益,在陈列展览方面就应具有多样性,应不断地追求创新,应充分发挥解说这一关键环节的作用。

一、多样性是陈列展览外化的必需前提

对陈列展览外延的划分包括基本的固定展览、辅助的专题展览、流动的巡回展览,它们之间只是形式机动与不机动、内容范围对象多少深浅的区分,而陈列展览的两个基本元素——图片、实物是根本的。由此似乎觉得我们主观上给陈列展览的空间太小了!陈列展览是对文物的外化,这种外化是纪念馆的一切劳动的结果,这种结果物化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志之中又体现了纪念馆劳动的水平。在今天,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作为纪念馆运用陈列展览手段应该是多样化的,因为文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不会自动表现出来的,它必须要借助一些手段才能被反映出来。各种技术手段、各样技术材料为陈列展览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技术和材料在发展趋势上逐渐地淡化陈列展览的传统观念。多样性是陈列展览发

展和呈现出活力的关键,并且也是文物价值外化的前提条件。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为例: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现场有了一定的辅助陈列展览,但陈列总馆的图片、文物数量及展览参观的观众只是监狱旧址的 15%。这根本的原因是渣滓洞、白公馆的辅助陈列与陈列总馆的基本陈列只是内容多少、形式规模大小的不同,基本陈列没有明显的区别。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 1999 年对基本陈列进行修改时做了精心的准备和仔细的策划。制定的陈列方案把“多样性”作为一条原则给以明确的规定。所谓多样性,就是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可利用的手段,给予陈列展览的各种展品充分的揭示,使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尽量地外化出来,让参观者能够得到最多的信息,使它有别于旧址的陈列。首先,将基本陈列的名称定为《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事迹展览》;其次,确定了图片文物、模型景观、电视多媒体以及艺术品四种主要的陈列表现形式;再次,派出设计人员到北京、上海、香港对陈列展览和材料进行考察。1999 年 11 月 27 日,在纪念红岩烈士殉难 50 周年的时候,红岩魂陈列馆对外开放。展示手段上的多样性,使基本陈列的可看性和吸引力大大地提高,从 1999 年 11 月 27 日开放到 2012 年的一季度参观观众人次与同期相比提高了 50%,而且参观者在展厅里停留的时间也由以前的 20 分钟增加到 40 分钟。从对参观者所作的反馈调查中,我们发现陈列展览多样性程度越高,参观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就越大,纪念馆所追求的效益就能够得到根本的保证,革命文物在社会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不断创新是陈列展览外化的基础

推陈出新,不断地发现和寻找新角度、新视点,让陈列展览保持活力和较强的吸引力,是纪念馆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手段上对陈列展览多样性有了根本的认识后,在方法上对陈列展览的外延也要不断扩大。纪念馆利用文物主要是给人以心灵的净化、思想的激励,所以极大地丰富陈列展览的外延,不断地创新也就成了外化文物的基础。作为露天遗址纪念馆的歌乐山烈士陵园,多年来一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制造吸引力?纪念馆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根本无法谈什么效益。再好的文物,没有多角度、多视点的宣传揭示,它的内在价值和思想内涵是不会自动走出来的。我们认为陈列展览绝不能局限于展厅里,陈列展览的多样性要求纪念馆围绕外延不断地创新,特别是要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变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从大量参观者对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过去感兴趣,对狱中斗争事迹信息需求量大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策划了“夜游渣滓洞、白公馆”的参观项目。为了更好地发挥“红岩魂”这一品牌的效应,我们在“红岩魂报告会”的基础上,策划了《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学院等的支持帮助下,将展览、报告、表演结合起来,探索了一种纪念馆陈列展览宣传的新形式。《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推向社会后,参观者反响非常强烈,每一场展演过程中,没有人中途退场,参观者多是饱含泪水不断地鼓掌来表达心中的共鸣。展演结束后,请报告人签名最多的一次有 200 多人!有参观者评价说:“展演为弘扬红岩精神找到一个非常佳的点,它可以让人非常真切地、发自内心地去感受共产主义理念,这样的点,我们现在很难找到,这

是对精神文化资源的重振。”“什么是理想、信念？今天看了展演，就得到了最清楚、最实际的答案。”展览是纪念馆的灵魂，是吸引参观者的核心。不断地创新是使陈列展览极大地发挥作用，把文物价值充分外化的基础。

三、解说员是陈列展览外化最重要的环节

尽量地把文物展品外化出来就能增强纪念馆对社会的吸引力，而纪念馆的陈列展览还必须借助解说才能很好地产生效益。在纪念馆里解说员是缺少不了的一个工作环节，只是对解说员的作用各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但是通过我们向观众调查，听了解说和没有听解说的效果不一样的结论却是明显的。首先，解说员是把纪念馆工作最终结果转化为效益的关键，因为在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解说行为的发生能够对观众的思想、心灵产生影响作用。从接待开始到进行解说服务，陈列展览与参观者的思想、心灵在解说员的语言中交流、碰撞。其次，不同角度的解说又能够适应不同的参观者需求。如果从系统的角度看，陈列展览是硬件，解说是软件。解说是完成陈列展览外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纪念馆。文物研究、陈列展览的成果通过解说员的劳动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每天几十场的解说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着我们追求的效益，从对产生的效益分析中我们又不断地调整陈列展览，每年上百万的参观者为我们非常重视的解说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最近的一份观众留言簿上一位团省委书记写道：“图片及解说撼人心魄，当年烈士的事迹真详尽，让人仰止垂泣，精神灵魂受到巨大鼓舞和高度升华。”

陈列展览最大限度地对文物进行外化，采取各种能够利用的手段，有新的创意、有新的手法，文物内在的价值就能够尽量地得到展示，而展示的客观效果又是依靠解说的劳动作用于参观者取得的。

（作者简介：厉华，职称：文博研究馆员；职务：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红岩恋——江姐家传》史实评析三则

——与作者丁少颖先生商榷

张正霞

丁少颖先生历时多年,不辞劳苦,访问了红岩英烈江竹筠、彭咏梧当年生活战斗的故地,采访了二人生前的十几位亲人、战友、同志、同事,搜集了大量翔实的史料,本着严谨认真的态度,终于完成了传记巨著《红岩恋——江姐家传》(以下称《红岩恋》),199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一经问世,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江竹筠、彭咏梧烈士亲友、研究者的首肯。是书真实、准确的史实为其成功增添了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但是,由于种种局限,是书在史实记述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本着求同存异,求真去伪的原则,下面就有关史实予以丰富或澄清。

一、李舜华的称谓

李舜华是江竹筠烈士的母亲,丁少颖先生的《红岩恋》记述人们对其称谓为“江三娘”,此称谓在全书中出现三次。第六章“想跟您走却找不着您”:(江竹筠)正看得起劲,母亲开始做饭了,竹筠又赶紧拿着书坐到灶前,一边帮母亲烧火,一边看书。门外有人喊:“江三娘,我拿几根烟!”母亲赶紧出门去,边走边嘱咐:“竹,小心看火啊!”竹筠“嗯”了一声。”在同一章中又写道:“母亲心善,乐于帮助他人,与观音岩一带上上下下的人关系都很好,人们都亲切地叫她‘江三娘’。”第十一章“大学生·彭太太·云儿妈”：“他和李舜华是老熟人了,就到李舜华的吊脚楼房去,在门外一阵大喊:‘江三娘!江三娘,给我两包烟!’喊了一阵却不见回音。推了一下门,虚掩着的门开了,一幅惨景骤然入目:江三娘死了,死在一张破床上!车夫知道附近的义林医院的李义铭是江三娘的三哥,忙不迭地去告诉了噩耗。”本人认为丁少颖先生的记述有误,人们称呼江竹筠的母亲李舜华不是“江三娘”,而是“江三孃”,理由如下:

(一)江正之的说法

江正之(江正榜)是江竹筠唯一的亲弟弟,他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1980年5月14日,他在《江正之谈姐姐》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母亲李舜华很大方,乐于帮助穷人,观音岩一带都叫江三

妯(孃)。”文中的“妯”为“孃”之废弃简化字。

(二) 李秀坤的说法

李秀坤(1939—)是江竹筠的亲表妹,是江竹筠的二舅李树荣的幺女儿。2009年,笔者采访了她,她说:“我们富顺称父亲的姐姐或妹妹为孃孃,又叫老子,结婚后,就在称呼前冠上夫家姓氏。我爷爷有四男四女共八个孩子,老大李义臣,我叫伯伯;我父亲李树荣是李家老二;老三李义铭,我喊三叔;老四李义清,我喊幺叔;女的大孃二孃我没有见过,我见过的就是三孃李舜华和四孃李泽华。1911年,三孃结婚了,嫁给大山铺江上林,我们又称她江三孃。”

(三) 四川、重庆方言

四川、重庆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区,在西南官话中,父辈中的女性称为孃孃,此方言如今仍活在人们的口语中。“孃孃”还见于书面语言中,《创造十年续篇》是郭沫若先生的作品,在文中,他使用了方言词“孃孃”。“‘小孃才’是良才的从姑母,矮矮的身材,团团的面孔,看来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哦!’我叫着,‘没想出你这样小的孃孃!’”黄尚军先生的《四川方言与民俗》:“普通话中的‘姑姑’、‘姨’对应四川话的‘孃孃’。”梁德曼先生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四川的合江、南溪、简阳称‘姑姑’(普通话)为‘孃孃’。”

综上所述,从以上三个方面考据,丁少颖先生的记述应有误,李舜华称谓应为“江三孃”,而非“江三娘”。而且,据李秀坤讲,李舜华去世的情景也并非丁少颖先生《红岩恋——江姐家传》中所描绘的那样。事实是“1944年7月的一天早晨,三孃正在大伯李义臣的茶馆门前的烟摊前摆放香烟,突然,她的身子一歪,中风了,幸好我大姐李慧礼正在她身边,立即扶住她,否则,就会摔倒在地。然后,就在我们睡觉的地铺旁摆了一张门板让她躺下。三孃临死前,嘴里不停地喊‘二哥’、‘二嫂’(我父亲母亲)。三天后,三孃就去世了,埋在五里店。”

二、何理立的原名

何理立是江竹筠烈士的同学、亲密战友。丁少颖先生《红岩恋》第四章“小女孩居然会‘用心思’”中记述道:“第一学期连跳三级的江竹筠,被分到小学第十八班。她有了几个很要好的学友:女同学中的何理立(当时叫何淑凤)、贺珏若,男同学中的刘既明(当时叫刘济民)、卜毅、王文中。”文中的何理立同志是江竹筠同志的同学、亲密战友,但是,《红岩恋》中关于其本名的说法,却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四)《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务纪实》

1934年8月,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出版了《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务纪实》,是书翔实地记述了解放前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的院务历史,在“本院在院院生一览记载”表中详细记录着学生入校的情况。将此表抄录如下:

本院在院院生一览记载

姓名	何淑富	江竹君
性别	女	女
年龄	13 岁	12 岁
籍贯	巴县	富顺
介绍人	何鼎臣	李树荣
保证人	何鼎臣	李树荣
入院年月	1930 年 2 月	1932 年 2 月
学程	同	初八学期
家庭职业	商	工
备考	附通	

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为民国三年(1914 年)二月八日,全川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联合富商何鼎臣、李义铭(江竹筠的三舅)、吴受彤、张琴舫、汪云松、杨培之、陈文贞等人合资兴办,免费收留孤儿孤女。1917 年,孤儿院从胜家公司缝纫女校搬迁到观音岩下面的大溪沟张家花园,由于孤儿院环境漂亮,教学质量高,许多富贵人家羡慕孤儿院小学好,将子女也送来读自费生,学费为每期 20 块大洋。1933 年 2 月,江竹筠在三舅李义铭的帮助下,以“无父为孤”免费入院,介绍人、保证人李树荣就是江竹筠的二舅,时任孤儿院事务长。何淑富是巴县人,家住观音岩附近,是富商何鼎臣的本家,1930 年 2 月进入孤儿院学习。孤儿院实行跳级制,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江竹君(江竹筠)虽然入学较晚,因成绩优异,跳级后与同样跳级的何淑富同班,二人后来成为亲密的同学、战友。何淑富即何理立。

(五)何理立自己的说法

2008 年,笔者采访了何老。在采访中,笔者请教其原名,何老明确地说自己原名叫何淑富,重庆巴县人。因为家住重庆市观音岩,由本家何鼎臣介绍,进入观音岩附近的张家花园重庆私立孤儿院读书。该孤儿院是刘子如、何鼎臣、李义铭等人联合开办的,主要招收观音岩一带的儿童入学,学费为每期 20 块大洋。何理立交了 20 块大洋的学费,而江竹筠因父死母贫免费上学。江竹筠非常珍惜迟到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刻苦,成绩优异,连跳三次级,便与成绩同样优异、同样跳级的何理立同班。因为共同的志趣,二人便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革命战友。

(六)《中华职业学校 1940 年会计训练班名册》

今重庆市渝北区回兴中学的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查阅该校校志,见到《中华职业学校 1940 年会计训练班名册》,上面赫然写着“何淑富、江竹君”之姓名。

因此,综上所述,何理立的原名应该是何淑富,而非何淑凤,《红岩恋——江姐家传》第四章“女同学中的何理立(当时叫何淑凤)”的记述应是错误的。

三、彭咏梧的党内职务

彭咏梧(彭庆邦)是川东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1948年1月在“云(云阳)奉(奉节)大(巫山)巫(巫溪)”武装斗争中光荣牺牲。关于其在1939年至1941年8月期间是否曾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历来存在分歧。丁少颖先生认为彭咏梧曾经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书记。他在《红岩恋——江姐家传》第一章写道:“这个后来影响了江竹筠终身的男人,名叫彭庆邦,来自下川东,以前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四川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书记。”对此说法,本文认为值得商榷。

(七)《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万县地区组织史》

在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县中心县委领导名录”中,翔实记录了1939年1月至1945年5月万县中心县委领导姓名。1939年1月,万县县委扩建成万县中心县委,受川东特委领导,欧阳克明担任书记;1939年2月,川东特委调黄蜀澄任书记;欧阳克明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因“国华中学事件”,同年9月,黄蜀澄调往重庆,欧阳克明调任大竹中心县委书记;张国钧代理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0月,张国钧奉调重庆,川东特委派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李莫止(江涛、凌霄、李德椿)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8月,李莫止调重庆,蒲华辅(蒲文旭、郑理中、老陈)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蒲华辅调川南泸县,冉益智(冉启熙、冉毛、肖青)任书记;1943年春节后,冉益智被调到重庆,周明波(周建侯)任书记,同年底,万县中心县委迁达县。1945年5月,周明波在达县病逝,冉益智由重庆到达县料理后事并清理组织。以上记录未见彭咏梧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另外,《红岩春秋》2005年第2期《孺子牛周明波》一文中亦未见彭咏梧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职务的记述。

(八)《血沃三峡——川东游击纵队纪实》

《血沃三峡——川东游击纵队纪实》是万州区党史研究专家杜之祥的研究成果。几十年来,杜老致力于彭咏梧的历史研究,著作《青松傲霜雪》、《血沃三峡——川东游击纵队纪实》以及即将付梓的《彭咏梧传》为其研究集大成者。他的著作中翔实记述了彭咏梧在1937年至1941年8月的革命经历。彭咏梧于1937年秋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7班,1937年末,6班的王夔(王庸)发展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10月,由王庸介绍,彭咏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彭咏梧做了万县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王庸的助手。7班党员多,成立了特支,彭咏梧任特支书记。1939年5月,王庸毕业离校,彭咏梧接替王庸担任万县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在他领导期间,万县师范学校有7名学生党员不慎暴露,彭咏梧将他们分别转移,无一人被捕。此事,经万县中心县委代理书记张国钧汇报给川东特委李莫止,特委遂将彭作为下川东领导骨干培养。1940年4月,彭咏梧临近毕业时,其政治身份不慎暴露,万县中心县委通知其迅速离开万县师范学校,暂时留在万县中心县委。最初,他被派往重庆红岩村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员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结束后,彭咏梧作为万县中心县委巡视员到云奉两巫一带工作,其间,他成功解救了被捕的王庸。1940年3月,云阳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变。同年8月,云阳县委书记

记江伯言撤离云阳,调往南充中心县委工作,彭咏梧接任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8月,彭咏梧因身份暴露,调往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云阳县委活动停止^①。

(九)《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

是书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是书第一章第四节“九·四川省党组织·中共万县中心县委”说“该中心县委于1939年1月在原万县县委的基础上成立,领导了万县、梁山……从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先后为欧阳克明、黄蜀澄、张国钧、李莫止、蒲华辅(蒲文旭)、冉益智、周明波(周建侯),委员先后还有李聚奎、郭汶、李英才、刘孟伉、胡昌治、犹凤歧、牟曼悦、孙慕萍”。文中未见彭咏梧(彭庆邦)的名字,而1942年8月,彭咏梧就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

综上所述,彭咏梧一生确与万县中心县委书记一职无缘。《红岩恋——江姐家传》中的记述不确。

(作者简介:张正霞,职称:文博副研究馆员;职务: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统一战线史研究部科长)

^① 杜之祥,血沃三峡[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9

小说《红岩》与红岩历史背景

厉 华

1961年,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市委常委们正在就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图书名称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本图书的书名,是因为图书中的内容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非作者的参与者刘德彬当时在全国作的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在狱中斗争事迹的报告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根据他们的报告编辑的《圣洁的白花》、《烈火中永生》、《禁锢的世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已经受到社会上的极大关注,一些知名的作家对书的创作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如茅盾、巴金、马识途等。因此怎样给图书取一个名称,在反复讨论设计数次而不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属于出版界的问题提交到市委来讨论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的一个观点使书名最终得以确定:这本书不仅是描写狱中斗争,而且应该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大多是在当年红岩村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红岩”,这是重庆这个城市的光荣历史。最后,市委常委会决定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地名——“红岩”作为书名。市委书记任白戈说:今后人们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起重庆就会说到红岩。

这是一本关于重庆一段历史的图书、是一本张扬这个城市历史的小说,这本书把这个城市历史积淀进行了升华,这本书使这个城市扬名中外。

一、罗广斌:红色作家的传奇人生

小说《红岩》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发行量的不断被刷新、各种艺术形式的不断呈现,使它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面不可忽视的现象。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单一型计划经济时期,小说《红岩》的革命英雄主义影响了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由单一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社会主义市